

# 證據導向實踐的諮商專業發展

孫頌賢<sup>1\*</sup>、劉淑慧<sup>2</sup>、王智弘<sup>2</sup>、夏允中<sup>3</sup>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sup>1</sup>、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sup>2</sup>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sup>3</sup>

本文透過本期所收錄的三篇文章與相關文獻，看見以「證據導向實踐」的諮商專業發展特性，以及三種諮商專業能力的重要性。在諮商專業發展部分，過去常以「科學家—實務者模式」做為基礎，強調科學理論在實務現場的實踐。而證據導向實務的諮商專業發展，更強調應從「落身之知」中獲得，需要從實務現場看到問題、發現問題、並進而解決問題。但落身之知往往是混淆的，需要經過科學檢視與整理，學習者本身也會經驗模糊矛盾感。本文認為，若能採取「證據導向實踐」的精神與原則，透過學術研究的探究精神，協助受訓者獲得更符合實務需求的落身之知。並在個人諮商專業發展上，朝向「諮商取向」、「諮商風格」、「德行風範」的成長。本文也從所收錄的三篇研究中，看見三種重要的諮商專業能力，包括：個人化諮商模式的發展力、系統合作的社會力以及自我覺醒的成長力。同時，若能以華人儒家思想所提供的倫理素養，更能促使諮商專業人士朝向「德行風範」的諮商專業發展。最後，本文亦提出對台灣諮商教育與訓練上的建議。

**關鍵詞：**科學家—實務者模式、諮商專業能力、諮商專業發展、諮商教育、證據導向實踐。

---

\* 通訊作者：孫頌賢，e-mail: sonhein@mail.ntue.edu.tw。

致謝詞：本文承蒙兩位審查委員給予寶貴且中肯的意見，特此致謝。

DOI: 10.3966/172851862018080052001

當今台灣諮商教育與訓練已行之多年，自從心理師法於2001年10月31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後，諮商心理師納入醫事人員執照的國家考試中，全國諮商輔導系所也隨之增加，報考諮商研究所的人數也隨年增加（林家興、謝昀蕤、孫正大，2008）。在台灣諮商輔導專業領域中，最早成立的「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從民國47年創會（原名：中國輔導學會）以來，今年也即將邁入六十週年慶祝了。筆者計算行政院衛生福利部（2018）所公告的統計資料，從民國99年至106年期間，已發出2260人次的諮商心理師之醫事人員執業證照。我們培育出這麼多的諮商專業人員，也顯見台灣在「諮商專業發展」上，累積了相當豐富且多元的經驗。「諮商專業發展」不僅是一種專業技術的養成，也是一條朝向人格統整的修行道路，而諮商專業該如何發展？又該如何具備哪些專業能力？本刊第52期所收錄的三篇實證性論文研究，包括：王玉珍（2018）的〈優勢中心生涯諮商與生涯召喚之諮商效果與影響經驗探究〉、林淑君（2018）的〈生態系統取向班級輔導活動設計實施與成效：以建立班級友善氣氛為例〉、以及張曉佩、李宜蓉（2018）的〈多元性別議題諮商能力：訓練方案對知識、覺察與技能影響之研究〉等研究成果，剛好展現了「證據導向實務（evidence-based practice）」諮商專業發展之風貌（Chwalisz, 2003），也讓我們看見了三種諮商專業能力的重要性，包括：「個人化諮商模式的發展力」、「系統合作的社會力」與「自我覺醒的成長力」等。

## 壹、證據導向實踐的諮商專業發展

諮商專業該如何發展呢？Skovholt與Rønnestad（1992）的研究，可稱之諮商專業發展的經典作品，該研究採取紮根理論，收集100名諮商師與心理治療師的資料，並依據不同資歷與學歷背景分成五組，從中抽取共20名研究參與者進行訪談，以獲得最多元、最廣泛的諮商專業發展經驗，研究結果將諮商專業發展分成八個階段：維持舊習（conventional）、進入專業訓練（transition to professional training）、模仿專家（imitation of experts）、條件性自主（conditional autonomy）、摸索（exploration）、整合（integration）、個別化（individual）、德行風範（integrity）等，以闡明諮商師經歷模仿與摸索的焦慮不安後，從單一「諮商取向」進展到多元學習，專業發展也朝向理論與實務融合的整合階段，進而在實務現場自在的展現專業，諮商師尤其還需要朝向個別化的發展「諮商風格」，在最後晉級至「德行風範」階段，至此，助人專業理念已經成為個人生命智慧的展現，諮商專業與個人生命經驗也融為一體，凸顯出諮商專業發展的特殊性，不只是一門職業，也是朝向發展生命智慧的個人修行。Moss、Gibson與Dollarhide（2014）針對諮商專業認同發展（professional

identity development) 歷程研究也發現，朝向成熟的諮商專業發展通常具備三個主題：從理想化朝向現實感 (idealism toward realism)，從專業耗竭轉向蓬勃生氣 (burnout toward rejuvenation)，以及從混亂分裂朝向一致性 (compartmentalization toward congruency)；其更認為，諮商專業發展應具備自我效度 (self-validation) 的發展，包括展現出更具現實感、更有活力的實務工作，以及在工作與生活上展現一致性自我效度發展，呼應了前述朝向「個人修行」的發展目標，應朝向更有活力、更自由、更熱愛生命的人文精神。

上述朝向「個人修行」的諮商專業發展歷程，顯示出諮商專業是一種從既有科學知識或專家（訓練者）專業素養所得的專業知識，然而這些知識是否足以因應實務現場個案的多元性？而諮商師個人生命經驗的複雜性，又將如何影響個人的諮商專業發展？在諮商教育與訓練的養成過程中，學院派所關注的焦點，是否會與實務現場有所不同？例如，一項以兒少諮商實務工作為主題的研究 (Mellin & Pertuit, 2009)，運用德懷術研究法 (Delphi) 邀請了12位學院派的諮商訓練師，以及15位諮商實務工作者進行訪談，並邀請他們排序出主觀認為兒少實務上所需要優先探討的研究主題，研究結果發現，學院派訓練師比較重視某些理論與個案特性的深究，但實務工作者更重視家庭或系統脈絡的影響，這顯示學院派訓練所關注的焦點，可能與實務現場的視野有所差異。

而李維倫 (2011) 將助人專業知識，分成「理論知識」與「行動知識」兩類，「理論知識」在於「認識對象」，而「行動知識」在於「認識自己與對象之間的關係」。而所謂的「行動知識」的本質，即是Dall' Alba與Barnacle (2005) 所謂的「落身之知 (embodied knowing)」，是指個體能認識到理論知識在實際情境與在地文化中的實際樣貌時，在此經驗所獲得的知識。李維倫 (2011) 認為，臨床訓練的本質也是一種學習歷程，此類強調獲取「行動知識」的專業，所獲得的專業知識其實就是一種「落身之知」，特別需要透過處境學習 (situated learning) 來獲得。事實上，Skovholt與Rønnestad (1992) 所建構的諮商專業發展歷程中，條件性自主、摸索、整合等階段，就是在經驗獲得「落身之知」的過程。可知，對諮商專業發展而言，行動知識可能更為重要的學習核心，諮商專業絕對不是一門單純的科學知識理解，更是透過行動、透過實務經驗，甚至透過實務現場中的「文化衝擊」經驗，促成諮商專業更具深度的發展 (洪莉竹、陳秉華，2003)，並藉此獲取「落身之知」，以逐漸形成專業能力。這不禁讓筆者反省，學校裡所教授與研究的「理論知識」，是否是實務現場所需要的「行動知識」？

### 一、「證據導向實踐」的諮商專業發展

依據前述Skovholt與Rønnestad (1992) 的諮商專業發展歷程論述中可窺探，在獲取「落

身之知」的過程，有著許多模糊、不安、焦慮、理論與實務知識混亂的經驗，這些「落身之知」是必須被整理的、被理解的、被指導、甚至是需要被科學研究檢證的，而「證據導向實踐」的諮商專業發展方式似乎可以解決這方面的問題。「證據導向實踐」是指秉持科學研究實事求是的精神，整合出諮商臨床經驗上對個案特徵的理解，並以此做為諮商臨床實務工作的方針（Carey & Dimmitt, 2008; Chorpita, Becker, & Daleiden, 2007; Chwalisz, 2003; Cooper, Benton, Benton, & Phillips, 2008），並可帶來較有效的諮商介入策略（Spencer, Detrich, & Slocum, 2012）。而Carey與Dimmitt（2008）論述了一套「證據導向實踐」的實務工作模式，充分展現出該模式的精神，包括：指認問題（problem description）：知道什麼樣的行為問題是需要被關注的；使用科學研究結果（outcome research use）：知道什麼是與行為問題相關的元素；介入評估（intervention evaluation）：知道什麼樣的介入策略會使結果不同。Carey與Dimmitt（2008）的論述也強調，證據導向實務工作應該以「團隊合作（team）」的方式來進行。看來，「證據導向實務」更重視將學術研究精神融入諮商時工作中，助人者也秉持此模式之理念，促成更成熟的諮商專業發展。採取證據導向實踐的大專院校諮商工作，不僅可以增加諮商師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Schiele, Weist, Youngstrom, Stephan, & Lever, 2014），甚至可做為危機處理的基礎，能提早預警危機發生的週期，減緩危機處理帶來的衝擊，以及預防專業耗竭（burnout）的發生（Wilkinson, Infantolino, & Wacha-Montes, 2017）。

而「證據導向實務」與諮商心理學中常年秉持著「科學家—實務者模式（scientist-practitioner model）」學習模式有所不同，「科學家—實務者模式」強調要以現有的諮商與心理專業知識為基礎，做為諮商評估與介入策略的依據（Hays, 2010），強調諮商實務工作者，應先成為心理學專業知識的心理學家，然後再接受諮商實務的歷練。而「證據導向實務」則強調秉持著科學家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精神，但在實務現場中進行「落身之知」的學習。李維倫（2011）則評論，可能較難在實務能力的培訓過程中落實訓練過程中，真正落實「科學家—實務者模式」，其認為在大學任教的專業教師較少從事實務工作，而醫院裡第一線的實務工作人員則少於從事學術研究，並且學校裡教授的專業知識與實務現場有所差距，單單把「科學家」與「實務者」之間用「連字符號」連接，似乎仍無法跨越學術活動與實務活動之間的鴻溝。因此，可能會發生，學校裡教的是一套，但實務現場又會是另一套，甚至實務現場會質疑學校裡教的只是理論、只是教授們的「想像」。而「證據導向實務」的諮商專業發展，則強調研究與整理自己的實務經驗，藉此度過Skovholt與Rønnestad（1992）所說的模仿與摸索期的焦慮不安時期，以及重新整合具自主性發展的落身之知與諮商專業能力。

本期所收錄的三篇研究，正巧也都體現了「證據導向實踐」之精神與原則。在王玉珍（2018）的〈優勢中心生涯諮商與生涯召喚之諮商效果與影響經驗探究〉一文中，採混合研究方法，同時進行實驗法與事後質性訪談研究，觀察到接受優勢中心生涯諮商的大學生在生涯召喚與自我效能上有所助益。此篇研究即是透過實際的實務介入，瞭解該優勢中心生涯諮商模式帶來的效果與影響，更可以從質性訪談結果中，其看到偏屬靈性層次的生涯召喚元素，如何在生涯諮商歷程中發揮效果。該研究累積了對生涯召喚以及自我效能的「理論知識」，也透過實務行動的歷程，看到優勢中心生涯諮商的「行動知識」。

而林淑君（2018）的〈生態系統取向班級輔導活動設計實施與成效：以建立班級友善氣氛為例〉一文，採取「行動研究法」，從生態系統取向重新看到校園霸凌（bully）議題，更重要的是重建學校或班級的正向氛圍與團體凝聚力班級，透過發展出第一次的行動方案與事後評估，形成第二次的行動方案，同時解決了校園中的霸凌問題，也同時透過該研究，累積了對校園霸凌行為本質的「理論知識」，也累積了對霸凌行為介入處理的「行動知識」。

在張曉佩、李宜蓉（2018）的〈多元性別議題諮商能力：訓練方案對知識、覺察與技能影響之研究〉一文中，設計出一套40小時的「多元性別議題諮商能力訓練方案」，並嘗試訪問40多名諮商專業受訓者如何透過該方案，逐漸覺察到自身顯而易見或隱而未顯的在多元性別議題，顯見該方案對諮商訓練的重要性與效果。尤其，該研究透過焦點訪談團體的質性研究方法，其研究成果最精彩，是累積了在多元文化議題中對「文化膠囊的思考慣性」的「理論知識」，該研究也清楚指出，透過「反思性學習」與「脈絡性」理解，可以促成諮商專業對於多元文化議題的敏感度，也同時累積了該訓練方案對諮商專業養成的「行動知識」。

另外，「證據導向實務」的精神與原則，也符合林耀盛（2014）認為，諮商專業發展應具備「樸實（simplicity）」、「謙卑（humanity）」、「耐性（patience）」的倫理態度；其認為，諮商與心理治療是一種協助他人改變的歷程，「樸實」是指助人者能真實的面對自己，瞭解對於促發改變所知的有限，在有限且確切的知識系統中，進行有多少、給多少的促發改變歷程；「謙卑」是指雖然我們具備諮商專業知識的準備，但在面對多樣且複雜的個案生命故事中，秉持著願意放下架構，重新看到個案的態度；「耐性」則是指在協助個案改變的歷程中，擁有願意陪伴個案緩慢改變或遭遇挫折的耐性。而本期三篇研究，充分展現出如何在其專業場域中，秉持著「樸實」、「謙卑」、「耐性」的倫理態度發展出具「證據導向實踐」的專業發展樣貌，對於整體諮商輔導專業的發展，具有重要貢獻。

我們更關心在目前台灣的諮商教育與訓練環節中，是否能將「證據導向實踐」的理念更融入其中？讓受訓者更早能理解獲取「落身之知」之重要性呢？可能，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讓學校裡的諮商實務訓練與實務現場結合，甚至可以考慮將諮商專業課程搬到實務場域中進

行。

## 二、獲取「落身之知」的多元方法

我們可能需要更多像本期王玉珍（2018）、林淑君（2018）、張曉佩、李宜蓉（2018）等三篇研究，充分發揮證據導向實務的精神與原則，串連起「科學家」與「實務者」之間的「連字符號」，實踐了從證據導向實務中獲取「落身之知」的過程師，以作為個人諮商專業發展之基礎。而此三篇研究，也顯示出在證據導向實務中獲取「落身之知」時的多元研究方法。例如，王玉珍（2018）採取了混合研究法、林淑君（2018）採取了行動研究法、張曉佩、李宜蓉（2018）採取了方案設計與焦點訪談團體等研究方法，不但凸顯出研究能力的培養在諮商教育與訓練中的關鍵性，還可為「證據導向實踐」的研究提供多元方法之參考。

這三篇研究，分別採取了混合研究法與主題分析法、行動研究法、內容分析法等多元且不同質性與量化資料做為「證據」，以發展出實務現場的落身之知。這正說明，若要依靠「證據導向實務」做為諮商專業發展的基礎，助人者更應該檢視自己在研究方法上用了什麼眼光與觀點，來獲取「證據」，以發展出落身之知，依然是諮商教育中，必要且充分的基礎訓練。這也顯示出在心理師訓練過程中，「研究方法」課程顯得非常重要且核心，也顯示出「研究方法」課程並沒有與諮商實務能力脫節，反而能幫助諮商專業發展中，培養出在實務現場中提問、檢證與掌握「證據」的能力。例如Peterson、Hall與Buser（2016）就報告了一項非常有趣的研究成果，該研究指出，實務現場的諮商師亟需要研究能力的訓練，尤其像是如何從實務現場中建構與整合所收集到的資料、如何對自己與他人詮釋所獲得的研究資料、如何從研究資料中進行心理健康程度的判斷、如何計算單一個案的改變程度等，都是實務現場的諮商師最期望瞭解的研究能力。

另外，在實務現場應學習如何獲取「落身之知」，也呼應了諮商專業發展更需要朝向「本土化」的方向，我們是否更應該關心處在華人文化脈絡下的個案、家庭、社會問題，到底該用什麼方式來促成問題的改善、是否有屬於我們華人文化特有的促發改變之介入策略？因此，我們主張諮商心理學的研究目標，應該重視本土化的發展方向，包括：外學引入的在地化，以及文化融合與文化繼承的本土化（王智弘、劉淑慧、孫頌賢、夏允中，2017）。而證據導向實務的諮商專業發展，有助於獲取具本土化的落身之知，我們不僅需要知道在本土化的實務現場中，什麼才是所謂的「行為問題」，什麼才是符合文化與脈絡的「促發改變策略」，以及什麼樣的「證據」才符合本土文化中所謂的「改變」。

如同前述林耀盛（2014）所指出的，心理師應具備「樸實」的態度，運用嚴謹的科學檢視方式，樸實地理解到底誰是個案？自己到底可以幫助個案什麼？採取「證據導向實踐」的

精神即是執行此樸實原則的手段。在諮商教育中，若僅偏向於實務技巧的操作，而無法從實務中，透過「證據導向實踐」的研究檢證，檢驗自己所獲得的本土化「落身之知」的正確性，很可能就會變成單純的「諮商技師」了。就像是在考試院的國家考試中，諮商心理師考試被歸類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一樣，這是一種狹隘的理解，也凸顯出國家政策對諮商心理師專業的誤解。

### 三、是否該朝向手冊化實務作業的訓練模式

有些學者主張，當某種實務介入策略累積了許多研究成果，該諮商專業發展應朝向「手冊化實務作業（manualized practice）」的諮商訓練方式（Brady & Redmond, 2017），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教育訓練與實務運作的養分，形成一套既定步驟與介入技巧的實務工作模式，以發揮更深遠的影響力。而本期三篇研究所發展出的實務工作模式，已經在科學實證上獲得效果證據，那是否該朝向「手冊化實務作業」的訓練方式呢？手冊化實務作業是指針對特殊個案、或某種學派，企圖發展出一套明確的實務行為指引，受訓者只要依照該指引手冊，就可完成該實務訓練（Brady & Redmond, 2017），並依此手冊化實務作業，不斷的複製更多的專業實務工作者。例如Leuty等人（2015）依據認知訊息歷程取向的生涯諮商模式，建構了一套手冊化的生涯諮商團體運作模式，並檢驗其效果，該研究強調，此方式可充分整合生涯研究知識與實務介入方法。

然而，李維倫（2011）整理了美國許多手冊化實務作業的相關研究與論述，認為該方式可能在專業訓練上會造成反效果，甚至侷限了心理專業實務能力的發展；主因是受訓者在此手冊化實務作業中，可能顯現出更多的防衛與不自然，手冊化實務作業會讓受訓者更容易變成在「模仿」該治療模式或介入指引，一方面失去了助人者的自主性，另一方面治療師必須在介入歷程中，一邊回憶該怎麼進行介入，而容易忽略了眼前個案的真正感受。

而在台灣，越來越多諮商學派的訓練或工作坊，都採取此「手冊化實務作業」方式，一方面標榜該學派擁有龐大的研究證據與科學知識的指引，另一方面將諮商技巧或學派的學習，予以清楚的步驟化，通常他們號稱有一個被認證的專業「訓練師」，並且提供通過該訓練方案時獲取「證照證明」的制度，讓諮商專業學習變得更容易、明確與清晰，免除了諮商發展中模糊性帶來的焦慮與不安，但也讓受訓者都變成了「同一個模樣」，像極了機器人製造工廠。Levitt與Jacques（2005）認為，諮商員在訓練中所經驗到的「模糊矛盾感（Ambiguity）」，是一種正常且重要的歷程，代表受訓者正經驗重新檢視自己、檢視個案的新歷程，協助受訓者增加忍受模糊矛盾感，會是諮商訓練的重要環節，而多元思考（multiplistic thinking）可協助受訓者在不確定感中，學習哪些理論知識對自己是適用的、哪

些實務介入對個案是有幫助的、以及更瞭解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助人者。Curry與Reinecke (2003)更清楚指出,「證據導向實務模式」也可避免「手冊化實務作業」帶來的限制,每個諮商專業人士的專業發展歷程中,透過在嚴謹的研究檢視與實務實踐的循環交錯中,終究是必須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諮商風格與學派。也許,這三篇研究更重要的貢獻,並非發展出了三套不同「值得模仿」的實務工作模式,也非告訴我們生涯諮商、學校系統合作、以及多元性別訓練上該如何進行實務操作的「正確答案」,而是回歸於每一位身為實務工作者的讀者,反思這些研究成果對於自己實務工作上的啟發。也許,諮商專業發展不應該是一套制式化的作業手冊,他更是個人特質與生命價值的實踐與展現,諮商專業學習沒有標準的答案與方式,但最後都可能成朝向「德行風範」的同一個味道。

## 貳、從證據導向實務中看見的三種諮商專業能力

不論採取哪種諮商訓練模式,都必須回答一個關鍵議題:在個人諮商專業發展中,到底該培養哪些專業能力?林家興等人(林家興、林旻沛、黃佩娟、胡薇瑄、江信男,2015;林家興、黃佩娟,2013)的研究,標示出諮商心理師應具備六種核心能力,包括:衡鑑診斷與概念化能力、介入能力、諮詢能力、研究與評鑑能力、督導能力及管理能力等。針對學校心理師實務工作內涵的研究(刑志彬、許育光,2014)則指出,從系統合作的「鉅視服務觀點」以闡明學校心理師的專業核心能力,應包括:要能與個人工作(深化諮商能力),也要能與系統工作(學校與家庭),以及與組織工作(學校行政與跨專業合作)等。面對多元化的社會變動與發展,諮商專業發展不僅要能包含上述研究所指稱的深化促發改變的諮商能力,還要能具備社會關懷的能力,從情境脈絡中獲取「落身之知」(李維倫,2011),不僅要能以生態系統觀進行系統合作,身為心理師,應具備社會關懷的能力,主動關懷社會議題與立法。透過本期所收錄的三篇證據導向實務的研究成果,剛好看見從這些「落身之知」中的三種專業能力樣貌,包括:個人化諮商模式的發展力、系統合作的社會力、自我覺醒的成長力。

### 一、個人化諮商模式的發展力

所謂的「個別化諮商模式的發展力」,是指能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個別化諮商風格,從Skovholt與Rønnestad(1992)的諮商專業發展研究可窺探,諮商能力的發展,主要從諮商理論的「諮商取向」,逐漸走向自主性的「諮商風格」,到最後融合專業發展與個人生命發展的「德行風範」。在王玉珍(2018)撰寫的〈優勢中心生涯諮商與生涯召喚之諮商效果與影

響經驗探究〉一文中，就可窺探該研究者如何從原先既有理論知識的優勢中心「諮商取向」，再依據自己的體驗而加入生涯召喚的靈性觀點，逐漸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諮商風格」。這種能夠在自己的諮商專業發展上，企圖深化與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諮商能力，此種「發展力」，似乎可納入諮商教育訓練中，成為受訓者可擁有的專業能力之一。該能力的發展，更可包含前述林家興、黃佩娟（2013）、以及林家興等人（2015）研究中，所指稱的衡鑑診斷與概念化、介入、諮詢等能力。而該研究主要透過「證據導向實踐」的發展原則，來獲得落身之知，以及逐漸發展出「個別化諮商模式的發展力」。

## 二、系統合作的社會力

所謂的「系統合作的社會力」，是指諮商專業發展中，能培養具備社會關懷與社會溝通的個人特質與專業能力。此部分所指的社會力，不僅能以生態系統觀點，以更鉅觀的視野來看待個案議題（王麗斐、李旻陽、羅明華，2013），還要能具備對諮商專業認同的社會關懷能力，如同林家興（2008）對台灣諮商專業發展的觀察與期許中所言，推動諮商心理師的立法、維護諮商心理師的工作權益、以及讓更多社會大眾理解諮商心理師的專業，也是重要的諮商專業發展內涵。而在本期收錄文章中，林淑君（2018）所撰寫的〈生態系統取向班級輔導活動設計實施與成效：以建立班級友善氣氛為例〉，正展現出生態系統合作實務的樣貌，其將校園內的霸凌行為，不只視為個人行為，而更能從鉅視服務的態度（刑志彬、許育光，2014），看到是整個校園與班級經營氣氛的議題，同樣透過「證據導向實證」的嚴謹研究檢視過程，更能看到對諮商輔導實務工作者而言，「系統合作的社會力」是重要的專業能力之一。

## 三、自我覺醒的成長力

在諮商專業的養成教育中，自我覺察一直是相當重要的元素與核心能力，如同邱珍琬（2012）研究自述的諮商風格的發展過程，即強調「自我覺察」的重要性。然而諮商養成教育中所遭遇的專業發展議題，可能是映照出個人議題的困難（許育光，2012），故能夠在諮商專業發展中，培養出足夠的自我覺察能力，是相當重要的環節。Dong、Campbell與Vance（2017）運用正念團體來增加受訓中的諮商心理師之專業，發現正念技術可增加心理師的自我覺察能力，進而促發諮商專業發展的層次。釋宗白、金樹人（2010）針對禪修正念團體對實習諮商心理師專業發展之影響的初探研究發現，透過正念團體增加了實習諮商心理師的自我覺察的敏感度，也同時促發放下專家的權威角色，實踐互主體的可能性，以及提升與個案同在的專注度。以上研究都顯示，培養諮商師的自我覺察能力，在諮商專業發展上具有十

足的重要性。

然而，本文主張「自我覺醒」比「自我覺察」更能貼切描述出諮商專業所需要的專業能力。Rønnestad與Skovholt（2003）認為，諮商認同的專業發展，是一種個人特質（personal self）與專業自我（professional self）的融合歷程，新手與老手諮商師在諮商取向的學習與或助人價值觀上並無差異，最大差異，還是在專業發展上，是否朝向能將個人特質與專業自我相容成為一致性的自我（Prosek & Hurt, 2014）。誠如Skovholt與Rønnestad（1992）以及Moss等人（2014）針對諮商專業發展的研究發現，諮商師是一種朝向「個人修行」的「德行風範」之旅程，諮商專業透過充足的自我覺察歷程，已儼然變成個人成長與成熟的生命發展歷程。可見，諮商專業發展，也同時是一種個人生命發展的修行道路。故與其說需具備「自我覺察」的能力，可能更適合使用「自我覺醒」來形容這種自我成長的能力，故本文使用「自我覺醒的成長力」，來說明諮商專業發展中需具備的專業能力。

本期的第三篇研究，張曉佩、李宜蓉（2018）所撰寫的〈多元性別議題諮商能力：訓練方案對知識、覺察與技能影響之研究〉，即展現了在諮商教育當中，培養助人者對於多元性別議題的敏感度與自我覺察之重要性，不管是顯而易見或隱而未見的刻板印象，透過所設計的訓練課程，加上證據導向實務的嚴謹研究檢視，即可窺探受訓者應從中自我成長中，逐漸培養出「自我覺醒的成長力」之諮商專業能力。

透過本期的三篇研究，可窺探這三種「落身之知」的諮商專業能力：個人化諮商模式的發展力、系統合作的社會力、自我覺醒的成長力，是如何透過「證據導向實務」獲得檢證與整理，也顯示這三篇研究成果，足以做為諮商專業發展中的模範，而充足的研究能力對諮商專業發展看來還是相當有助益的，也期待有更多相同類型的 research 主題，可以被發表與被看見。

#### 四、聽不見的弦外之音—倫理素養的重要性

事實上，這三篇研究展現了朝向諮商專業發展中的三種重要專業能力，然若依據Skovholt與Rønnestad（1992）的觀點，諮商專業發展最終是朝向「德行風範」的方向前進，這些透過證據導向實務來整理與獲取的「落身之知」之專業能力，是否足以促成更成熟的諮商專業發展歷程呢？Rønnestad與Skovholt（2001）針對資深的心理治療工作者之專業發展，發表了一項非常具有啟發性的研究成果，其發現：第一，生活與專業經驗，會雙雙交疊地影響著專業發展。第二，深刻的歷程性經驗（processing of profound experience）是促成較高諮商能力的關鍵，這種深刻的歷程性經驗，往往來自實務的體驗轉化成治療的智慧。第三，專業發展成為資深心理師的晚年的修行途徑（viable avenue），並深深受到最初的諮商專業學

習經驗影響。也就是說，專業發展不再只是一份諮商工作，更成為許多資深心理師晚年檢視自己、創造生命活力的重要來源，也在晚年生活中，成為自我成長與修行的重要依據。若是如此，朝向德行風範的諮商專業發展，所需要的就不只是透過「落身之知」上獲取的「專業能力」，「證據導向實務」也不一定能完全完成德行風範的成熟發展，也許更需要像是「儒家思想」對於華人諮商專業發展上所提供的啟發。

傅偉動（1999）的「創造的詮釋學」指出五層辯證的詮釋步驟，第一、「實謂」層次：原思想家實際上說了什麼？第二、「意謂」層次：原思想家想要表達什麼？第三、「蘊謂」層次：原思想家可能要說什麼？第四、「當謂」層次：原思想家應當說出什麼？第五、「必謂」或「創謂」層次：原思想家現在必須說出什麼？或創造的詮釋學者現在必須踐行什麼？依據王智弘（2017a, 2017b）所提出的儒家諮商觀點，從「必謂」或「創謂」層次，更認為助人者不只應具備前述的三種諮商專業能力，更應具備的「倫理素養」，來促成「德行風範」的諮商專業發展，該倫理素養，包括，（1）成己以成人：諮商專業人員要成人之美之前應先成己之美，也就是說，應先做到修養自己的功夫；（2）修己以安人：諮商與心理治療，是人在治療人，不是技術在治療人，諮商專業人員要先以恭敬心修養自己，然後以自己的修養來安定當事人之心；（3）倫理先於學理：諮商專業人員應以「孝」、「悌」、「信」、「愛眾」、「親仁」等倫理之道為先，專業學理才能有所依；（4）盡己以推己：應具備「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追求自我成長就是「忠」、「推己及人」的善待他人助其成長就是「恕」等倫理素養，並且秉持「盡己而後推己」來實踐諮商專業中的「同理」精神；（5）道德先於技藝：諮商專業人員應秉持「志於道，據於德」的道德修養，而後「依於仁」的倫理生活實踐，才進一步進行「游於藝」的專業能力學習；（6）至誠致中和：強調諮商專業運作，除了要能契合一時一地的社會文化，依然要能契合天地萬物之道。其中，藉由「成己」、「修己」、「盡己」、「至誠」、「致中和」，以提升「自我覺醒的成長力」的功夫，以做為「成人」、「安人」、「推己」、「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與天地參」等倫理素養，或許，可培養出朝向「德行風範」與具「成人之美」的諮商專業人員。

### 參、在諮商教育上的啟發

本文也期望從前面的論述，在台灣諮商教育上，給予一些建議與啟發：

第一，在諮商教育中，可融入「證據導向實務」的精神與原則，並落實「處境學習」原則，協助受訓者分辨「理論知識」與「行動知識」的差異，協助學生從中獲取「落身之知」。

第二，在諮商教育中，依然需要重視「研究方法」的訓練，藉此來檢視與整理助人者自身經歷的「落身之知」，以累積更豐富的有效助人知識與能力。尤其透過學術研究的訓練，培養助人者檢視自己獲取「證據」的眼光與方式，而避免落入獲得偏頗且侷限的行動知識。

第三，在諮商教育中，更應該強調與加強「樸實」、「謙卑」與「耐性」的倫理態度，透過「學術研究能力」的訓練，是讓諮商師保有「純良之心」的後盾，並能以當事人的真正受益做為諮商專業人員自我策勵的標竿。

第四，諮商教育是協助受訓者走向「德行風範」的生命發展歷程，應避免變成偏頗的技術或職業訓練，教育者應體認到，過度強調技巧的訓練方式，可能會讓受訓者錯失理解諮商專業本質的機會。

第五，諮商教育應避免「手冊化實務作業」帶來的侷限。尤其，在面對受訓者經驗到「模糊矛盾感」的經驗時，更應避免過度給予「手冊化實務作業」訓練，模糊矛盾感可能是協助受訓者走向更自主、更具個人諮商風格的發展機會。

第六，在諮商教育中，應更重視「倫理素養」的融入，重視人文思維與文化涵養，以奠立專業理論與技術之道德根源與倫理養成，華人諮商專業人員尤其可以融入本土文化的內涵與智慧，以培養修己安人、成己成人、盡己推己、至誠致中和的道德倫理素養。

本文期望透過以上論述，對台灣諮商教育有所啟發，也期望對想投身諮商專業以做為終身志業者，提供一個反思的心理空間，重新檢視諮商專業對自己的意義，一起來體驗諮商專業發展帶來的「成人之美」。

## 參考文獻

- 王玉珍（2018）：優勢中心生涯諮商與生涯召喚之諮商效果與影響經驗探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2。[Wang, Y. C. (2018). Strength-centered career counseling and career calling: The effect and affective experience.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52. doi: 10.3966/172851862018080052002]
- 王智弘（2017a）：探索本土諮商心理學的發展理路。*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9（1），vi-xvii。[Wang, C. H. (2017a).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9(1), vi-xvii.]
- 王智弘（2017b）：探索本土諮商心理學的理論基礎：以儒家的諮商觀點為例。*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9（2），vii-x。[Wang, C. H. (2017b).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The concept of Confucian counseling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9(2), viii-x.*]

- 王智弘、劉淑慧、孫頌賢、夏允中（2017）：文化脈絡中的危機、轉機與復原力：本土諮商心理學研究的方向、目標與策略。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0，1-28。[Wang, C. H., Liu, S. H., Sun, S. H., & Shiah, Y. J. (2017). Crisis, chance, resilience and culture context: Probing into the direction, goal and strategy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50*, 1-28. doi: 10.3966/172851862017120050001]
- 王麗斐、李旻陽、羅明華（2013）：WISER生態系統合作觀的雙師合作策略。輔導季刊，49（3），2-12。[Wang, L. F., Li, M. Y., & Luo, M. H. (2013). Cooperative strategies between guidance teachers and mentors with WISER cooperation of ecological system approach. *Guidance Quarterly, 49(3)*, 2-12.]
- 刑志彬、許育光（2014）：學校心理師服務實務與模式建構初探：困境因應與專業發展期待分析。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9，117-149。[Hsing, C. P., Hsu, Y. K. (2014).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for the Practice Essence and Service Model of the School Psychologist: Analysis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Copying and Profession Expect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39*, 117-149.]
-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2018）：醫事人員發證人數。取自衛福部網站：<https://dep.mohw.gov.tw/DOS/cp-1728-2921-113.html>，2018年6月18日。[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8). *Medical staff practicing data query*. Retrieved from <https://dep.mohw.gov.tw/DOS/cp-1728-2921-113.html>. Date retrieved: 2018/6/18.]
- 李維倫（2011）：反思臨床心理學訓練：探究美國「科學家—實務者」模式與專業能力學習的本質。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4（2），173-207。[Lee, W. L. (2011). Reflecting on the training in clinical psychology: Exploring the scientist-practitioner model and the essence of professional learning.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4(2)*, 173-207. doi: 10.30074/CJMH.201106.0002]
- 林家興（2008）：台灣諮商心理專業的發展與挑戰。輔導季刊，44（3），99-102。[Lin, C. H. (2008). Th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of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in Taiwan. *Guidance Quarterly, 44(3)*, 99-102. doi: 10.29742/GQ.200810.0012]
- 林家興、林旻沛、黃佩娟、胡薇瑄、江信男（2015）：心理師能力評量表之編製及其信效度分析。教育心理學報，47（1），63-86。[Lin, C. H., Lin, M. P., Huang, P. C., Hu, W. H., & Jiang, S. N. (2015). The constructio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tudy of psychologist competency rating scale.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7(1)*, 63-86. doi: 10.6251/BEP.20141008]

- 林家興、黃佩娟（2013）：台灣諮商心理師能力指標建構之共識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4（3），735-750。[Lin, C. H., & Huang, P. C. (2013). Development of competency benchmarks for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in Taiwan.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4*(3), 735-750. doi: 10.6251/BEP.20121003]
- 林家興、謝昀蓁、孫正大（2008）：諮商心理師執業現況調查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3，117-145。[Lin, C. H., Hsieh, Y. J., & Sun, C. T. (2008). Practice Survey of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in Taiwan.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23*, 117-145. doi: 10.7082/CJGC.200803.0117]
- 林淑君（2018）：生態系統取向班級輔導活動設計實施與成效：以建立班級友善氣氛為例。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2。[Lin, S. C. (2018). An action research on ecological system approach guidance activities applying to rebuild class friendly atmosphere.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52*. doi: 10.3966/172851862018080052004]
- 林耀盛（2014）：迂迴，成邏輯：人文取向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的「成人」之路。哲學與文化，41（1），129-156。[Lin, Y. S. (2014). Logic of detour: Humanities orientation to explore the "human-becomings" process of counsel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of therapeutic view.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 Culture, 41*(1), 129-156.]
- 邱珍琬（2012）：我的諮商理論取向及型態形成過程——一個自述研究。應用心理研究，56，55-97。[Chiu, C. W. (2012). My counseling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and pattern formation process: A readme study.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56*, 55-97.]
- 洪莉竹、陳秉華（2003）：諮商員專業發展歷程之文化反省經驗。教育心理學報，35（1），1-17。[Hung, L. C., & Chen, P. H. (2003). Cultural reflections in counsel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5*(1), 1-17. doi:10.6251/BEP.20021216]
- 許育光（2012）：碩士層級新手諮商師領導非結構諮商團體之經驗分析：個人議題映照與專業發展初探。輔導與諮商學報，34（2），23-44。[Hsu, Y. K. (2012). Analyzing the experiences of master level trainee counselors leading unstructured counseling group: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personal issue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34*(2), 23-44.] doi:10.7040/JGC.201211.0023
- 張曉佩、李宜蓉（2018）：多元性別議題諮商能力：訓練方案對知識、覺察與技能影響之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2。[Chang, H. P., & Li, Y. R. (2018). LGBT issues and counseling competency: The impact of training on enhancing knowledge, awareness and skills.

-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52. doi: 10.3966/172851862018080052003]
- 傅偉勳 (1999) : 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台北: 三民書局。[Fu, W. H. (1999). From the creation of hermeneutics to Mahayana Buddhism. Taipei: Sanmin Book Company.]
- 釋宗白、金樹人 (2010) : 止觀、無住—「禪修正念團體」對實習諮商心理師自我關注與諮商實務影響之初探研究。教育心理學報, 42 (1) , 163-184。[Shin, T. B., & Jin, S. R. (2010). The qualitative study of "mindfulness group" toward the self-care and counseling practice of counselor intern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2(1), 163-184. doi:10.6251/BEP.20100423]
- Brady, B., & Redmond, S. (2017). Connect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Perspectives on the role of manualized programs in youth work. *Child & Youth Services*, 38(3), 252-268. doi:10.1080/0145935X.2017.1326306
- Carey, J., & Dimmitt, C. (2008). A model for evidence-based elementary school counseling: Using school data,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to enhance practic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108(5), 422-430.
- Chorpita, B. F., Becker, K. D., & Daleiden, E. L. (2007). Understanding the common elements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Misconceptions and clinical exampl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46, 647-652. doi:10.1097/chi.0b013e318033ff71
- Chwalisz, K. (2003).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 framework for twenty-first-century scientist-practitioner training.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1, 497-528.
- Cooper, S. E., Benton, S. A., Benton, S. L., & Phillips, J. C. (2008).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psychology among college counseling center clinicians.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Psychotherapy*, 22(4), 28-50.
- Curry, J. F., & Reinecke, M. A. (2003). Modular therapy for adolesc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In M. A. Reinecke, F. M. Dattilio, & A. Freeman (Eds.), *Cognitive therapy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2nd ed., pp. 95-127). New York, NY: Guilford.
- Dall'Alba, G., & Barnacle, R. (2005). Embodied knowing in online environment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37(5), 719-744.
- Dong, S., Campbell, A., & Vance, S. (2017). Examining the facilitating role of mindfulness 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development among counselors-in-training: A qualitative approach. *Professional Counselor*, 7(4), 305-317.
- Hays, D. G. (2010). Introduction to counseling outcom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Counseling*

- Outcom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1, 1-7. doi:10.1177/2150137809360006
- Leuty, M. E., Bullock-Yowell, E., Womack, A., Schmidtman, E., Paulson, D., Wiebusch, L. A., & Osborne, L. K. (2015).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practice in one training program: Outcomes of a manualized career counseling group. *Counse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28(3), 286-304. doi:10.1080/09515070.2015.1053432
- Levitt, D., & Jacques, J. (2005). Promoting tolerance for ambiguity in counselor training programs. *Journal of Humanistic Counseling,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44(1), 46-54.
- Mellin, E. A., & Pertuit, T. L. (2009). Research priorities for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with youth: Implications for counselor prepar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Counselor Education & Supervision*, 49(2), 137-155.
- Moss, J. M., Gibson, D. M., & Dollardhide, C. T. (2014). Professional identity development: A grounded theory of transformational tasks of counselors.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92(1), 3-12.
- Peterson, C. H., Hall, S. B., & Buser, J. K. (2016). Research training needs of scientist-practitioners: Implications for counselor education. *Counselor Education & Supervision*, 55(2), 80-94.
- Prosek, E. A., & Hurt, K. M. (2014). Measur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development among counselor trainees. *Counselor Education & Supervision*, 53(4), 284-293.
- Rønnestad, M. H., & Skovholt, T. M. (2001). Learning arena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etrospective accounts of senior psychotherapists.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32(2), 181-187. doi:10.1037/0735-7028.32.2.181
- Rønnestad, M. H., & Skovholt, T. M. (2003). The journey of the counselor and therapist: Research findings and perspectives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areer Development*, 30(1), 5-44.
- Schiele, B. E., Weist, M. D., Youngstrom, E. A., Stephan, S. H., & Lever, N. A. (2014). Counseling self-efficacy, quality of services and knowledge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in school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Counselor*, 4(5), 467-480.
- Skovholt, T. M., & Rønnestad, M. H. (1992). Themes in therapist and counselor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70(4), 505-515.
- Spencer, T. D., Detrich, R., & Slocum, T. A. (2012).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 framework for making effective decisions. *Education & Treatment of Children*, 35(2), 127-151.
- Wilkinson, C. B., Infantolino, Z. P., & Wacha-Montes, A. (2017).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s a

potential solution to burnout in university counseling center clinicians. *Psychological Services*, 14(4), 543-548. doi:10.1037/ser0000156

收件日期：107年07月15日  
複審一日期：107年07月19日  
複審二日期：106年08月02日  
通過日期：107年08月15日

## Counsel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Sung-Hsien Sun<sup>1\*</sup> Shu-Hui Liu<sup>2</sup> Chih-Hung Wang<sup>2</sup> Yung-Jong Shiah<sup>3</sup>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sup>1</sup>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sup>2</sup>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sup>3</sup>

With three articles from this 52th issue and the support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aimed to explore two key subjects, namely, counsel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d counsel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n the past, the counsel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counseling education were often advocated based on the scientist-practitioner model, emphasizing the practice of scientific theory in the practice field. We try to discuss the benefits of the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the counsel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learning carried out in the counseling profession could be categorized as a form of embodied knowing. In the counsel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the counselors not only need to learn theoretical knowledge, but also need to learn action knowledge and embodied knowing. However, embodied knowing can often cause confusion and has to be scientifically reviewed and consolidated, and learners may also experience unclear and contradictory situations. If the spirit and principles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can be adopted, the resulting application of the spirit of inquiry originating from academic research will help trainees to acquire embodied knowing that is more effective, and allow them to undergo development that emphasizes counseling approach, counseling style, and integrity. We also saw three important counsel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in the three papers included in this issue,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strength of individualized counseling models, the social forces of systematic cooperation, and self-awakening growth.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counseling profession development, if it can be based on the ethical literacy provided by Chinese Confucianism, it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unseling professionals to the "integrity". Finally, this paper also presents several suggestions on counsel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aiwan.

**Keywords:** Counseling education, counsel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counsel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idence-based practice, scientist-practitioner model.

---

\* Corresponding author: Sung-Hsien Sun, e-mail: sonhein@mail.ntue.edu.tw  
doi: 10.3966/172851862018080052001